

声漫山门

陕北民族音乐志

横贯街衢、五颜六色的秧歌队，
箫鼓追随、大吹大擂的鼓乐队，
再加上难得一见、席地而跪、数以千计、令人动容的信众，
几乎消失于农业文明之外的集体仪式，
让人感到工业时代塑造的独立个体之林再也难以组构的动人
心魄的盛况。

张振涛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声漫山门

——陕北民族音乐志

张振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张振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039 - 5881 - 6

I. ①声… II. ①张… III. ①民族音乐—研究—陕北地区
IV. ①J6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839 号

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

著 者 张振涛

责任编辑 王 红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881 - 6

定 价 52.80 元

致 谢

2000年4月18—19日，我和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学友田耀农，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高渠乡一个叫作白家墕的小村庄，采访一户村民的葬礼。村里人说，此处严重缺水，每天早晨要赶着毛驴到四里地外驮水，当地人没有洗澡这种起码的卫生习惯，只有姑娘出嫁时，才能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发丧人家的女儿含泪告诉我们：“娘最疼我，出嫁那天早晨，端了一瓢水让我洗脸。”这个“端了一瓢水”的疼爱，在当地语境中相当于山西煤老板婚礼上的十几辆“悍马”。2000年初，村里总算打了几口深井，部分解决了饮水问题。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年降雨量只有几十毫米。夏季的几场雨，各家各户决不放弃天赐良机，把祖祖辈辈留下的容水器皿，全部派上用场，陶盆瓦罐、木桶石槽，摆满庭院，接满雨水，然后，存放于荫凉处，沉淀变清。难以想象，他们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黄土高坡扎根立业。

小山村里，天早早就黑下来了，院中没灯，虽然通了电，但窑洞只有一个灯口，昏暗朦胧。采访一天，疲惫不堪，想早早歇息。然而，就在这个水比粮食珍贵的地方，入睡前，主人竟然端来了两盆烧好的热水，让我们洗脚解乏。这是人生中最平凡又最难忘的瞬间。我坐在炕沿上，眼瞅着那一盆热腾腾的清水，不知道该不该把脏兮兮的脚伸进去，却禁不住双脚发抖。厚道的陕北人，如此招待着每一位外乡人：宁肯自己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惜水如油，也要让客人宾至如归。在主人欢喜的目光下，我洗了一生中最认真的一次脚，动作夸张，尽量让主人看到我们多么开心。实在说来，洗脚解乏，平凡简单，却真是舒服呀！最后，主人悄然把水倒在牲口槽里，盆底朝天，滴水不漏。

2011年10月1日晚，从刚刚结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音乐会”

的人民大会堂出来，长安街上，华灯璀璨，如同白昼。金水桥两侧数米高的水柱，如泉如瀑，水花四溅。坐在车中，我却突然想到了黑黝黝的白家塢。天安门广场，得天独厚，比中国任何一块地方都明亮、都滋润，这里聚集了中国最充裕的灯柱和水柱。密密麻麻的灯口，排排列列的喷泉，亮度之强，水源之沛，让覆盖的空间，通明无影；让金水河床，波光粼粼。这是中国的心脏，中国的象征，集天下之财力，呈一方之丽景。此时此刻，我记忆中的白家塢，依然一片漆黑。村里人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明亮的地方。这种对比，就是“国家”与“民间”闪现于脑海中的反差。

研究民歌的人去陕北，研究秧歌的人去陕北，研究说书的人去陕北，研究大唢呐的人也去陕北。对于在 20 世纪历史机缘中一次次托举出来的陕北音乐，大多数知识分子抱着朝圣的态度。录制了民歌，拍摄了秧歌，记录了说书，学习了唢呐。收集素材的作曲家走了，收集资料的音乐学家则必须住下来，一点点解释，为什么陕北的民歌、秧歌、说书、大唢呐，在 20 世纪被扶至国家殿堂？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为主流文化式样并成为大众追寻的典型。除了教科书上唠叨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外，还因为那里的艰苦环境，产生了灯火通明、水源丰沛的地方永远产生不了的刻骨铭心的民歌和如怨如慕的唢呐，因而让白家塢与天安门之间，形成了一条相互联系的甬道。以“现代性”理念和文化资源再生的视角，审视这宗民间文化入主国家厅堂的世纪学案，确实是个足够吸引人却颇有难度的话题。这就是本书之所以确立这一主题的原因，自然，主题的确立，某种程度上基于白家塢与天安门反差间的体悟，也基于像白家塢那样的采访点带给我的感动。

回想数年来在陕北遇到的民间吹手，历历在目。陪伴我们在白家塢采访的唢呐吹手常文洲已经故去，他一边埋头制作唢呐一边解答我们没完没了问题的神态，常常浮现在我写作时的追忆中。他听不到我们向他致谢了，但常家人的事迹，我已收录书中——那是中国民间艺人跨越龙门的最打动人心的故事。佳县白云观记忆超群的道长张明贵，米脂县文化馆质朴勤奋的馆长高万飞，米脂李家沟才气横溢的李岐山，常文洲的徒弟高九，镇川的何占银……这些陕北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不但是因为他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乐观，更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无助时施以援手的那种厚道，如同端着一盆冒着热腾腾洗脚水的老乡（我甚至不可原谅地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们从外来采访者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相反，却要花费

大量时间陪着，管我们吃住，但本着一起记录乡土文化的共同态度，他们乐呵呵地向我们讲述自己的音乐和故事。采访是索取也应该是回报，是采访者感谢被采访者为记录实现从而引领我们走进历史、体验艺术因而吐出心中感恩的机会。我们无法感谢所有在场的人以及已经不再“在场”的人，但书中的记录，将成为一段留下他们声音和语态的历史，这多多少少让记录者感到安心。

本书的写作，始于世纪之交的香港，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做助理研究员。为编辑出版《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后，仍然舍不得离开母校。老师深知我心，申请项目，得以继续留校，一年内忙于计划实施。之所以把这些写下来，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说明曹本冶先生在我的生活和事业中的意义。不但就读时的阅读和写作，老师还满足了我一次次没完没了的要求。不能不说，一授业，二聘任，三助资，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了解惑。如此深恩，焉能不铭记于心？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了三本乐种调查的书，是历次乡村体验筛选下来的三颗含金量较大的颗粒。冀中音乐会的考察和研究，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10年后冠以《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之名，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刊行。晋北考察也持续数年，2009年出版了《吹破平静——晋北鼓吹乐的传统与变迁》。陕北考察，起始早，截稿晚，直到现在，才和盘托出。总结起来，竟都与一个“北”字有关：河北、晋北、陕北。与学友开玩笑：人生道路上，一直仰望北斗，不断在“找北”，而且确认：只有脚踏乡野，才能找到指引前行的“北斗”。

“陕北是中国革命摇篮”的比喻有点老套了，但每个人都会把催生出某种生命的地方视为“摇篮”——引发和延伸了生命并激发梦想的地方。以此而言，诞生了新的学术生命的地方就是“摇篮”，那里唱出的歌就是“摇篮曲”。

最后还想说，让许多学者非要把过去的采访用心记录下来的动力，来自陕北当地令人动容的乡亲。他们用自己的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换来了新中国；也用自己的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换来了新中国的文化，当然也换来了制定文化长略者的思考并使乡音居于全国民间文化首席地位的殊荣。不知道有多少到陕北采访的人得到过上述的那种洗脚解乏的待遇，凡经此历，都应涌泉相报！

目 录

开 篇 落脚陕北与中国经验 / 001

第一章 信天长风——走进现代的陕北音乐 / 021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 / 024

第二节 陕北民间音乐的四次兴盛 / 033

小 结 心灵上无法告别的陕北民歌 / 072

第二章 吹手的生活和吹手的话 / 075

第一节 乐班调查 / 077

第二节 经济收入与招揽生意 / 095

第三节 艺匠之辩与口述史的意义 / 108

小 结 个人因素的历史作用 / 124

第三章 唢呐话语——米脂乐班三重奏 / 127

第一节 三家乐班评述 / 129

第二节 国家权威——三家乐班见分晓 / 152

小 结 编配三重奏 / 160

第四章 红与白——白云山庙会 / 165

- 第一节 佳县白云观 / 168
- 第二节 道士与道乐 / 178
- 第三节 庙会中其他艺术活动 / 191
- 第四节 仪式与音声 / 201
- 小 结 区域文化网络 / 205

第五章 声漫山门——横山县马坊牛王会 / 211

- 第一节 2010 年杨口则牛王会仪式 / 214
- 第二节 2011 年马坊牛王会仪式 / 252
- 第三节 牛王会组织 / 269
- 小 结 灯池与文化之网 / 283

第六章 丧葬仪式 / 289

- 第一节 仪式一 / 292
- 第二节 仪式二 / 297
- 第三节 仪式三 / 301
- 第四节 仪式四 / 303
- 第五节 两位“阴事”的自述 / 318
- 第六节 丧葬仪式功能 / 321
- 第七节 跪拜：一个常规动作的非常规“变奏” / 334
- 小 结 音乐体现孝道 / 348

第七章 说书、秧歌、婚礼 / 351

- 第一节 说书人的心愿 / 353
- 第二节 韩起祥的榜样与曲项琵琶 / 366
- 第三节 “秧歌”还是“阳歌” / 380
- 第四节 参与甜蜜——婚礼仪式音乐的另一种解读 / 387

小 结 重新评价民间储藏 / 400

第八章 乐器与宫调 / 403

第一节 乐器与宫调 / 405

第二节 新组合与乐曲 / 421

小 结 回归本体 / 438

结 语 二度写作 / 441

参考文献 / 451

开 篇

落脚陕北与中国经验



绣金匾

2000年2月7日至15日（农历正月），我与乔建中、萧梅第一次到陕西省榆林市进行田野考查。收拾行囊，带上相当专业的摄像机、录音机、电脑笔记本和纸质笔记本、手电筒、尺子、音叉等工具，启程赶往乔建中家乡。

这次采访因为颇具“中国特色”而值得细谈。

一、田野考察与中国经验

乔建中家有11个兄弟姐妹，基本上都在榆林工作生活。对我们来说，落脚点的条件可谓天赐，既在生活上不愁吃喝，又在行程上安排周到。2月6日晚，登上从北京到大同的火车，翌日清晨在大同火车站内，从一列客车转到另一列客车，衔接紧密，既让人有几分担心错过，又占了便宜似的图个省时节力。火车从大同开往神木需要一个上午。一下火车，乔家兄弟已在几辆崭新的日产越野车旁等待多时。钻入新车，穿越沙漠，中午就坐在榆林的饭桌前了。这条路乔建中不知蹚过多次了，无须查询，无须计算。即使列车时刻表上查到了，也决不可能把两趟车次精准对接，至于接上茬的接站，更是天衣无缝。团队出行，亲情相接，一路畅通，自然没有西出阳关的悲凉。此时此刻，“老马识途”就非不关痛痒的说辞，而让人尝到实惠、咂摸出“轻车熟路”的“田野意义”。

从早到晚，一切活动，皆由乔家兄弟周密安排。城中老户，关系密布，盘根错节，信息畅通。瞬间布下“千里眼”、“顺风耳”，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有如神助。人有出身和养育的本土环境，一如植物。中国人的“关系”，就是方便快

捷的生活带和信息网。一条条网络如同延长了的腿脚耳目，触面倍增。根本不需忙里忙外、打探问询，一系列丧葬、庙会，什么时间举办，什么地点举办，什么人家举办，信息接踵而至，只需选择就是了。其实，信息已被懂得民俗的兄弟们过滤了，省去了外来人无从判断的工夫。住在乔家，不但节约开支，吃到最地道的可口饭菜，还常在饭桌上，伴着陕北土豆、丸子等传统美食咀嚼时的啧啧赞叹，了解到大量风俗民情，聊天中自然涌现出一大堆对外来人具有充足信息量的知识。从事各行各业的兄弟，几乎知道我们渴望知道的所有民俗，迅速消解了门外汉的懵懵懂懂。

专业人士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调查才能评估的信息，对于熟悉家门口民俗的本地人来说，一下子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例如，哪家庙会重要与不重要，他们不需要什么人类学、社会学、仪式学的知识，只需根据生活经验中哪个庙会扎堆的人多，鼓乐班子的数量，戏班子唱几天戏，商贩摊位多少，就能判断孰重孰轻，而且脱口而出，精准无误。这种信息自然就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无须说，自己换乘火车、长途车，固然可以融入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跟随推推挤挤的人群踏上长途车，常常想到北京车接车送的感觉），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儿，一处处打听，一点点了解，一步步探索，即使人家指了道路、说了地名，还会像无头苍蝇满大街转。这条路是向东拐还是向西折？那个庙是位于街南还是街北？庙会是后天还是大后天？送丧是早晨还是下午？鼓乐班是住这个村还是下个店？“找不到北”的感觉，要持续好一阵子。待摸熟了方位，时间已耗得差不多了。当然，免不了毕恭毕敬拜访当地素昧平生的权威，说话客客气气，态度恭恭敬敬，请人吃饭，陪人喝酒，浪费时间，消耗精力，还不一定问在要害处和点子上，还不一定按时看到地地道道的仪式。而一年一度的岁时节日以及可能一年只有一次的仪式，错过了就毫无余地，再等下一年。

强调田野考察的“中国经验”，是因为采访对象不能自我呈现，没有迅速进入特定关系网的准入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熟人关系，可以一下子带你入围，省时省力，事半功倍。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①，对于熟悉中国“关系网”的人来说，转借此话，就点到了要害。连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外国人都把无法翻译的“关系”像“功夫”一样作为内涵丰富、直接读音的词念，中国人何不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利用“关系”？我们指导学生选择采访点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说：首选家乡！这不就是因为有一张现成可用、提供信息和便捷方便的“关系网”，省时省力，省钱省工吗？至少为进入田野的新手提供一个被证明在熟人社会里有效保护自己和提高效率的方法。课堂上现买现卖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理论时，正愁找不到例证，不想得来全不费功夫，榆林采访不是可以拿来解释中国学者“一个猛子”扎进田野的现身说法吗？

立足熟人社会，利用关系网络，缓解初来乍到的惶恐，解决盲人摸象的茫然，破除“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困局，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安全和全面视听的位置上。“中国经验”与西方人类学考察“他文化”不同，中国人何不择善而从？缘木求鱼，舍近求远，跟着人家屁股跑，且非“指蓟北而弹云南也”？这似乎是西方人类学不允许的方法，却恰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也许，10分钟前，你还在翻看一份权威杂志，阅读田野方法的宏论，念叨如何开问“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为什么、何以如此），而后便到了一座陌生小城，两眼茫然，手足无措，连找个合适的落脚点儿都不知道，更无从下手寻找采访对象。这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了，先领着你走进便宜实惠的住所，一边吃着特色菜，随口介绍哪家乐社年头几何，哪家乐班新来乍到，然后带着你走进庙会，抬抬手指给你看草台上宛如面具一样的脸谱象征的角色。这些需要“外星人”花上十天半个月还不一定“整明白”的事，当地人几分钟就“搞定”。所以，径直进入“关系”，熟人会把一道道景观依次展示，不但解构得让你心领神会，阐释上也入木三分。这样的便宜事儿，何乐而不为？

如何“进入”田野，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说的、听的，还是学术会议和教科书上说的、听的，没什么新鲜的，似乎无须讨论，只需遵循外国祖师爷提出的法理就行。^① 田野考察在西方民族音乐学与古代采风的两大观念夹击下，成为缺乏吸引力的洼地，特别被西方理论统治后，导致的陷阱至今未被本土特色

^① 肖文礼总结道：“‘field work’（田野工作）并非新鲜话题，简单回顾，它经由人类学家哈登（A. C. Haddon）引入、博厄斯（Franz Boas）倡导、里弗斯（W. H. R. Rivers）实践，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那里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此后，日益成为人类学及相关专业的核心内容和界定标识。”肖文礼：《赣南客家岁时节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11年。

填满。之所以没有新意，就是因为“中国经验”的缺失。

其实，“进入”隐藏着如何寻找捷径、迅速切入的窍门，隐藏着第一脚落在哪里的立点？我们痛斥跟着西方跑，所做所循，却一点不中国！凭什么不相信“关系”？非要强拉硬扯、自我批判、一味认同考察“他文化”的陌生？既然可以轻车熟路，驾轻就熟，非要跑到“没关系”、“无人脉”的荒漠，两眼一抹黑，“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享受“关系”，以最短时间获取信息，一步到位，每天都有新鲜事，说起来就让人开心。外国理论需要反刍和本土化，田野考察法是基于西方学者所处地域、所处时代、了解异文化的目的和思考，倚重的是“局外人”面对“他文化”的前提。我们当然尊重人家的经验，但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所处的时空。好理论应该引进，若水土不服，也不能发挥效能。只有当外来品种与家园水土嫁接，引进的说道才被容受，理论内生力才能释放。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只有了解本土社会结构，才能摆脱生拉硬套，开列适合国情的“入境”手续。

正是因为人脉资源和熟人关系带来的好处在陕北屡被验证，让我生出总结经验、加以推广的冲动。是否可以套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句老话，提倡“到祖国最熟悉的地方去！”“到祖国熟人最多的地方去！”在音乐学家尚未富裕到不计成本时，那里就是“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的福地。“适彼乐土”，“其乐融融”！无须说，我们尝到了甜头。

我在纪念周吉的文章中谈道：

从近现代延续到当代的音乐学写作史上，出现了一大批立足家乡并从家乡文化中挖掘出光彩景观来的学者，这些与西方民族音乐学“局内人”不能从事本土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相反的事例，说明了中国人依恋乡土的特殊情愫，他们为家乡演绎出来的立论上牢不可破、阐释上洋洋大观的著述，成为中国音乐学建立理论体系的基柱。这样的学者灿若群星，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学的耀眼天河：杨荫浏、曹安和之于江苏，李石根、冯亚兰之于西安，杨匡民、王庆沅之于湖北，王耀华、蓝雪菲之于福建，杨久盛、李来璋之于东北，杨民康、周凯模之于云南，陈克秀、景蔚岗之于山西……他们共同构成了对本土文化埋首挖掘和深情表达的系列。毋庸置疑，只有家乡人

才能对方言体会得入木三分，对乡俗了如指掌，对乡音体味透彻。通过他们，中国音乐学差不多绘制出了一幅完整的乡村音乐分布的全景图了。杨荫浏为这幅音乐地图描上了第一笔，后人接续着点上了一片又一片生花妙笔。^①

如上面所列，家乡人“治”家乡文化的实例多了去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把家乡文化说得清、道得明，而且恣意汪洋、激情澎湃，达到外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深度？近些年文学界讨论的“中国经验”，讲得就是这个理儿！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和做事的方法，浑然不觉的“本土经验”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土壤之上，建立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之中。离开它寸步难行，离开它就不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这种反思值得深思。

2001年4月11日至25日，我与钟思第（Stephen Jones）、田耀农，再到榆林市、米脂县、佳县采访。回到榆林后，我与田耀农先回北京，把钟思第丢在那里，让乔家人照顾他。为长途跋涉而节约“每一块铜板”的钟思第，免费入住乔家老宅，每天喝着如同“英国奶汤”一样营养丰富的陕北小米粥，因享受“老红军待遇”而乐得四仰八叉。他比我们更充分体会到“关系”的神通广大和法力无边，因而对“关系”赞不绝口。有人帮忙，对学者来说，且只是开支节约与吃喝方便？

二、黄土高原上的国际会议

说起来这次意义深远的田野考察，竟然引发了一件值得记录的事，促成了几年后一次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黄土高原的浓厚民俗和神秘仪式，让人迟迟不愿离开，甚至早年离开家乡的乔建中，也没有作为学者如此沉下心来仔细观察过自己的乡俗。于是，我们动了翌年再回来住上一段，并建立一个长期考察点、记录一个年轮中所有民俗事项的念头。大家一同意识到，积淀了太多传统的陕北，是需要挑选出来加固文化记忆的地方。

2001年，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召开过一次小型碰头会，乔建中、萧梅、笔者、荷兰学者高文厚（Franck）与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inck）夫妻，提出了

^① 张振涛：《木卡姆——周吉的心醉之源》，《风声入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364页。

一个令人兴奋的议案，并做出一个历史性决定，在中国召开一次边采风、边讨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距此次碰头会的数年前，钟思第也提出过相似议案，但那时没人敢接。相隔数年的碰头会，都对未来产生了影响。两个提案除了都产生于北京外，还有一个相同处，就是把外国学者与国内学者联手采风作为第一前提。

荷兰“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简称“磬” CHIME，即英文缩写的读音）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国际学术组织，每年一次例会，已在世界音乐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基金会实际管理者高文厚与施聂姐夫妻，一直渴望在中国举办一次实验性会议，为中外学者提供新的交流方式与合作机遇。此愿与我们希望在榆林做点什么的想法一拍即合，这就是那次碰头会的历史性决定。于是，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榆林市政府，共同举办了“多重视角下的黄土高原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CHIME国际学术研讨会”（11th CHIME Conference Fieldwork Project: Joining Forces Musical Fieldwork in China）。为筹办会议，我与乔建中再赴榆林。市委书记派人约谈，并以战略眼光回应了我们的建议。

2006年7月16—28日，会议如期举行。来自荷兰、美国、瑞典、丹麦、比利时、英国、俄罗斯、捷克等8个国家，以及中国11所大专院校及音乐研究机构的54位代表聚集在榆林。国外学者是：

荷兰：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Chime Foundation）；

美国：Jonathan Kramer，NCSU大学音乐系大提琴教授；Beth Szczepanski（中文名：潘舒雅），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Mercedes Dujunco（中文名：吕梅丝），美国学院亚洲音乐教授；Samuel Sapristein（中文名：夏高林），巴德大学（Bard College）学生；吴蛮，美籍华人琵琶演奏家；周雅文（Yawen Ludden），肯塔基大学（Kentucky）教授；Levi Gibb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学生；Ania Peczalska，上海美国留学生；

英国：Marnix Wells，英国中国音乐史研究员；Joyce Newberry，项目合作人；

比利时：Claire Chantrenne，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博物学家；

芬兰：Mari Salli，芬兰西贝柳斯研究院；

瑞典：Marja Kaikkonen，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John Meiling，瑞